

1935年春，红军挺进师临危受命，肩负起抗日先遣队策应长征的艰巨使命，挺进浙西南，建立根据地，掀起革命高潮，有效吸引并长期牵制国民党大量兵力，直接减轻了长征中红军主力的军事压力。浙西南革命为策应长征这一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历史转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先遣队北上掩护红军主力战略转移

1934年5月，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准备进行战略转移。为掩护中央及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6月下旬，中革军委令红七军团返回瑞金，改编为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行动。

中央为何令先遣队北上行动？时任先遣队参谋长的粟裕曾回忆道：“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朱德在1973年12月回答军事科学院提问时也证实了这一说法，“是（红军主力）准备退却（战略转移），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掩护）”。

1934年7月7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任务。先遣队浴血转战，横跨闽浙赣皖四省。其间一度转战到浙西南，占领庆元县城，夺取竹口大捷，歼敌300余人，俘敌200余人，活捉国民党庆元县长，随后转战至龙泉县境内。在先遣队的艰难转战中，中央不断电令指挥先遣队夺取水口，攻打福州，提出先遣队不要在闽北苏区停留，全力破坏敌人后方交通，攻占遂安，并以遂安为中心建立苏区，欲使先遣队的行动起到立竿见影的掩护作用。

10月17日，在先遣队的掩护下，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8.6万余人，踏上战略

浙西南革命：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策应

□ 余群勇 周德春

编者按

在中央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前，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成立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福建北上到闽浙赣皖边区以调动和牵制敌人。在先遣队的掩护下，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为了进一步策应中央红军行动，中革军委又增强先遣队兵力，以期发挥更大作用。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先遣队余部组成挺进师，在浙西南掀起革命高潮，在国民党腹心地区竖起不倒的红旗，为中国革命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奋斗诗篇。本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一鲜为人知的革命史实。

转移的征途，开始长征。

挺进师入浙策应红军主力长征

1934年11月，转战至闽浙赣苏区的先遣队，接到中革军委11月4日电令，要求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对外仍称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编为第十九师，“仍出动于浙皖赣边新苏区，担任打击‘追剿’的敌人与发展新苏区的任务”；红十军编为第二十师，“执行打击‘围剿’敌人与保卫苏区的任务”。由此，先遣队完成掩护任务后，中央又令其增加兵力，继续北上行动，执行发展新苏区、保卫老苏区任务以策应长征。

但是，由于先遣队兵力依然过小和“左”倾错误影响，1935年1月，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地区遭敌重兵包围进攻，指战员损失大部，方志敏等主要领导人被俘后牺牲，仅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先头部队突出重围，北上行动失败。

此时，长征中的红军主力处于国

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之中，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广大白区的工作均陷入困境，国民党军继续以堡垒战分割东南各省苏区，对红军进行分进合击，闽浙赣苏区和红军游击队处于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进剿”之中，中国革命面临严重危机。

粟裕、刘英率部转移至闽浙赣苏区，随即接到闽浙赣省委传达的中央指示：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建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由此，挺进师临危受命，肩负起先遣队未尽的历史使命，从战略上策应红军主力长征。

中央指定挺进师的行动地域为浙江。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在国民党倾力“围剿”红军主力时，在其“素称平安之区”的浙江燃起革命烈火，即可触痛其中枢神经，达到策应红军主力长征的目的。也正因为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所以浙江的革命斗争环

良好效果。

展现高超领导艺术，妥善解决伤病员闹事问题。随着东北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大量伤病员从前线下来，后方医院爆满。有的伤病员以功臣自居，不听命令，不守法纪，无理取闹。罗荣桓知晓这些情况后，感到问题相当严重。他及时召集部队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和政府民政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解决办法。在听取大家意见后，罗荣桓指出：解决伤病员闹事问题，应该从积极方面着手，在抓紧治疗伤病员的同时，不放松管理，严惩极恶劣人员。他提议在适当时候召开一次伤病员代表大会。大家非常赞同这一提议，并按照罗荣桓意见，将会议定名为“荣誉军人代表大会”，确定参加会议的代表，大多为调皮捣蛋爱闹事的人。罗荣桓认为，这特别符合会议的主题，使他们来直接受教育，回去后现身说法再教育别人，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948年8月，经过一系列精心准备，荣誉军人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那些心怀怨气、爱闹事的伤病员，准备利用这一时机大闹一场。但一到哈尔滨，他们顿时怨气全消。车站、大街贴满欢迎标语，群众敲锣打鼓、高喊欢迎口号；下车后女生纷纷给他们戴上大红花；接待人员热情地为他们端茶送水；食堂给他们精心准备了伙食；医护人员细心地为他们诊治护理……他们得到了战斗英雄一般的欢迎和拥戴。由此他们深受感动，深深自责之前的无理要求和想法。

大会邀请时任东北军区军工部长何长工等两位老红军，讲述他们在长征时期战斗负伤后的光荣经历以及不畏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宣传我军严格遵守部队纪律、群众纪律的优良传统。同时还专门介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双目失明的境况下，以钢铁般的意志写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的感人事迹。

代表们通过接受各种教育，心灵得到洗礼，思想转变很快。多数爱闹事的伤病员对照榜样检查自己过去的言行，反思彻底、境界提升，纷纷表示回去后迅速改正错误，争取早日上前线杀敌立功。最后，罗荣桓亲自讲话。他充分肯定了大家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并诚恳作自我批评，主动承认工作没有做好的领导责任。同时要求大家严格遵守纪律，不居功自傲，积极参加后方工作，继续为人民立功。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这些伤病员代表回去后带头遵守纪律，并且现身说法，主动做战友的工作。从此，伤病员闹事的情况较好地杜绝了。

境特别恶劣：浙江自1922年建立中共组织，至1927年6月建立中共浙江省委，在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省委屡遭破坏、先后换了10任书记或代理书记，其中8位书记和15位委员以上领导人牺牲，迫使中央于1929年4月撤销浙江省委建制，以免继续遭受更多的损失。挺进师入浙前，党在浙江曾先后发动和领导了遍及50多个县的60余次武装斗争，但均遭镇压，全省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对于500余人的挺进师来说，在毫无依托的情况下，要进入浙江行动，无异于“垂饵虎口”。

1935年2月，挺进师从赣东北出发，踏上挺进浙江的征程。

掀起浙西南革命高潮

1935年4月，历经艰难转战的挺进师，在庆元县濠郎地区以500之众迎击3000余敌，取得大捷，从而打开进入浙西南的通道。挺进师乘胜迅速挺进浙西南腹地，在松阳县境受到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等领导的当地进步群众组织欢迎，获得了群众依

托，使挺进师如鱼得水，获得发展。接着，挺进师“集中以打击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和群众工作，在浙西南实行武装割据，创建革命根据地。

挺进师的武装斗争，砸碎了浙西南人民脖子上的枷锁，人民纷纷投身革命，踊跃参加革命组织，恰如时任挺进师师长的粟裕所回忆：“红军所到之处，都有大批群众簇拥着，复仇的呐喊声、胜利的欢呼声山鸣谷应，日夜不绝。”在浙西南人民的支持下，挺进师迅速燃起浙西南革命烈火，在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之时掀起了浙西南革命高潮。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地方游击队以及农协会、互救会、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各地党组织、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到处是分田分地的繁忙热烈场面，挺进师发展到1000余人，扩编为5个纵队。

浙西南燃起熊熊革命烈火，深深触痛了国民党当局的中枢神经。国民党浙江省当局的喉舌《东南日报》惊呼道：“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

唱响军史工作的“三重奏”

□ 颜 慧

军史工作是我军写家谱、树碑立传的工作，对培育“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锻造“四铁”过硬部队具有重要意义。当前，部队编制体制和力量体系重塑，军事研究专业力量流失较为严重，部队军史资料档案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受到一定影响，基层单位的存史编史工作有所削弱。尤其值得高度关注的是，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有所抬头，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吸引眼球、“刷流量”，利用网络、微博等发表一些歪曲历史真相的所谓“历史细节”丑化党和军队历史，以“解密”“独家秘闻”等为反动物物翻案、“低级红”“高级黑”的现象比较突出。军史工作必须适应时代发展变化，整合力量体系，创新新方法手段，唱响“三重奏”，彰显新的生机和活力。

军史工作是一项群众性工作，既要充分发挥专职研究人员的主力军作用，又要发挥广大官兵和民间力量的补充作用。军史研究工作绝非专职人员的专利。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都有能力有条件参与这项工作，并且是不可或缺的力量。这几年，军事研究工作呈现可喜局面。但从整体上看，军事专业研究人员重改革史、建设史研究，对战例战将研究挖掘还不够，重宏大叙事式研究、轻微观考证式研究还比较普遍。而民间力量和广大官兵受制于各方面条件，对微观战史研究比较活跃，轻中观、宏观战史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比较突出。

新时代加强军史研究工作，必须把专职研究力量与民间力量很好地结合运用起来，实现功能作用互补。既要采用工程化的思路，引导军史研究专职人员把重大问题研究做深做实，又要以开放的心态和协作的理念，充分激发民间力量和广大官兵的研究积极性，引导其善于从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维度研究和解读我军历史。对民间研究成果，凡是合理的、实事求是的，要及时予以采信，吸收到官方的研究成果中来，成为有益补充。

军史工作是一项全面记录我军发展壮大工作的工作，既要重视对战例战将的研究，也要重视基层部队的存史编史工作。战例战将研究是军事研究的重头戏。每个战例背后都蕴含着交战双方在战略运筹、作战指挥、兵力运用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是指挥员学习战争的最好教材和一面镜子。毛泽东倡导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并要求把“详战战例”作为提高指挥艺术的重要途径。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要研究战争、研究军事、研究打仗。战将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决定和主导着战争的胜利。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军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将领，但我们对战将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上将萧华曾感叹：“我们打了那么多年仗，涌现出来的名将名帅像星星一样多，他们在军事史上占据了席位，可又有几个在文学画廊里也占据了席位呢？”对于我们这支已经40多年没打过仗的军队来说，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力度去研究战例和战将，借鉴过去、照亮未来。要充分利用现有研究成果，加强战例数据库建设，共享研究资源、提高研究起点，为部队军事训练提供丰富素材和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我们要高度重视基层部队的存史编史工作。这是军史工作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开展军史研究、学习、教育和宣传的活动前提。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杯热土一杯魂。我军自1932年3月红四军第11师在赣州战役中表现突出被第一军团授予“铁军”称号以来，相继涌现出“强渡乌江模范连”“大渡河连”“黄土地功臣炮连”“狼牙山五壮士”“刘老庄连”“塔山英雄团”“济南第一团”“临汾旅”等一大批英雄群体，这些都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深入做好部队特别是英雄群体的存史编史工作，发挥资政育人作用。对军史管理部门来说，要指导部队及时跟进收集，做好文献史料、图片影像、文物实物的征集管理工作，并定期编纂出版，搞好军史研究成果转化，真正把“红色基因”融入官兵

血脉。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而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前途实堪可虑！”面对后院起火、红色堡垒筑到家门口、地方武装对付不了挺进师的境况，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抽调中央军入浙，调集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约7万兵力“清剿”浙西南。罗卓英任军长的第十八军，下辖四个师，装备精良，人员充实，训练有素，战斗力强，控制和欺骗民众的手段极其狡诈；其师、团长黄维、霍揆彰等后来成为国民党军中的名将；第十八军又是长期在江西“剿共”的老手。可见，在对付挺进师，国民党当局可谓下了血本。

9月中旬，面对数十倍的强敌进攻，挺进师采取“敌进我进”方针，留下第二、第五纵队在根据地内坚持斗争，主力迅速跳出敌人包围圈，挺进敌后吸引、调动敌人，并伺机开辟新的根据地。9月25日，挺进师主力突破敌人封锁线，进入浙闽边境活动。但国民党军主力不为所动，除派出约五个团的兵力追堵挺进师主力外，仍将几十个团的大部队死死围住浙西南。

国民党军的“清剿”，自1935年9月19日发动进攻，至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才结束。在长达8个月的反“清剿”斗争中，挺进师以少量兵力抗击了国民党军大部队的进攻，不仅歼灭了敌人的部分有生力量，而且牵制了敌人几十个团的兵力，掩护了挺进师主力南下浙闽边开辟新的游击区，打破了国民党妄图于11月20日前将挺进师“肃清”的计划。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有效吸引、调动了“围剿”的国民党军队，减轻了红军主力长征的军事压力，实现了挺进师战略策应红军主力长征的目标。



血脉。

军史工作是一项常做常新的工作，既要继续用好传统媒体，也要善于运用新兴媒体，打造特色品牌，传播正能量。我军历史就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搞好军史宣传教育，不但可以普及军史知识，使广大群众知道我军从哪里来的、有哪些辉煌成就，而且可以传承弘扬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社会传播正能量。

过去，我们对新兴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重视不够，军史正面宣传业态和手段多样化不足，“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现象比较突出。在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和宣传工作的主战场的大背景下，一方面，要继续用好传统媒体，占领主流媒体的传播阵地。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历史文献纪录片《断刀》，讲述抗美援朝时期的战斗历程和辉煌业绩，在部队反响很好。2018年11月，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举办的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在军内军外、网上网下获得好评和点赞。目前，军史场馆建设规划已经军委批转印发，应指导各部队制定建设方案，推动在全军尽快落实。另一方面，要善于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发声，抢占网络、微博、抖音等新兴媒体的舆论阵地，推动军史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特别是对网络关注的历史敏感问题，军史工作者要充分利用档案馆、资料室、革命遗址、纪念馆等资源，加强资料的收集考证，第一时间在网上发声，为历史敏感问题提供令人信服的第一手资料。对网络上恶意污蔑军史和英雄人物的事件，要敢于亮剑，有理有据予以反驳，以正祛邪，使正能量成为新兴媒体的主流。



革命将帅

罗荣桓军队政治工作二三事

□ 王恩宝

罗荣桓是党、国家和军队卓越领导人，我军政治工作奠基人。为了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罗荣桓作为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的主要负责人，创造性开展工作，以杰出的才能和智慧作出了重大贡献。

推广诉苦运动经验，把握部队政治教育方向。1947年夏季攻势前，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第3纵队出现并推广以诉苦为主要形式的阶级教育活动。该部从土改教育入手，推选苦大仇深的战士（包括被俘后参军的“解放战士”），向大家讲述入伍前他们曾吃的苦、所遭的罪，带领大家“诉苦水”“寻苦根”，开展认真练兵、争立